

丰子恺和商务印书馆

樊东伟¹

（上海开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 200080）

【摘要】：从少年时代到作品逐渐享誉出版界的过程中，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之间有着全方位紧密的合作关系：处女作《寓言四则》刊发在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上，商务印书馆成为其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舞台；从崭露头角到盛名远播，丰子恺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期刊供稿计 142 篇之多，与商务印书馆在书籍上的合作也有十多次，并将自己的第一本译作交由其出版。二者有如此密切合作的重要基础是丰子恺在商务印书馆内有较为广泛的人脉网络等，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出版社同作者之间互惠互利的本质联系。

【关键词】：丰子恺 商务印书馆 合作

【中图分类号】：K825.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20）05-0026-10

以丰子恺与出版机构之间关系为主题的研究，目前仅见林素幸《丰子恺与开明书店：中国 20 世纪初的大众艺术》^{①②}一种，此书主要讲述丰子恺的哲学思想与艺术以及 20 世纪初中国大众艺术的主要历史背景和不同文化圈风格，只有最后一个章节着重讲述丰子恺和开明书店的关系。

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作家、书法家及翻译家，是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先驱，其在民间乃至文化界的影响力远超一般作者。同丰子恺有过合作的出版机构数量众多，合作方式和内容类型多种多样。他依托出版社成名，而出版社也视其作品为行销之保障。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是丰子恺早期创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合作方。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在与丰子恺长达十余年的合作中，双方互惠互利，产生了非常显著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对于丰子恺来讲，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并不亚于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同丰子恺之间的密切关系，显然尚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本文在此作些探讨。

一、处女作的发表

1914 年 8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第四卷第二号“儿童创作园地”栏目中，刊登了浙江一位小学生丰仁的作品《寓言四则》。这四则标题分别为《猎人》《怀挟》《藤与桂》《捕雀》的寓言故事由文言文写成，作者在标题旁还标注了每个故事的寓意，如“戒贪心务寡欲”“戒诈伪务正直”“戒依赖务自立”“戒移祸务爱群”等。不仅如此，这位细心的小作者还在故事末尾加上一段按语，如在《藤与桂》一文后，按语是“丰仁曰人无自立之精神惟以依赖为事鲜有不失败者吾辈少年其慎思之”。^③为体现少年丰子恺的作文原貌，兹录其第一则寓言如下：

¹**作者简介**：樊东伟（1967-），男，江苏南通人，上海开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辑，主要从事上海近代出版文化研究和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

²①此书由陈军翻译，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猎人（戒贪心务寡欲）

秋高风厉。草木枯落。猎人欲襟粮。挟弓矢。入山觅兽踪迹。半日。苦无所获。倦坐石上。意甚懊丧。忽见草间兔睡方酣。大喜过望。将弯弓射之。俄有鹿过高原。猎人见鹿之大也。遂舍兔而逐鹿。鹿行固速。相距又远。不之及。亟还取兔。则兔已醒而逸矣。大恨而归。丰仁曰。贪心一起。每易失败。寄语少年。勿如猎人之两无所得也。斯可矣。⁽¹⁾

这位时年 16 岁的少年丰仁，便是日后名扬中华的文化大家丰子恺。这一年，丰子恺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位于家乡石门镇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毕业。同年秋天，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看到这本刊登了他处女作的杂志时，丰子恺已经离开家乡，开始了在省城杭州的求学生涯。

《少年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创刊于清宣统三年二月（公历 1911 年 3 月）的一份月刊，一直出版到 1931 年 12 月，时间长达 22 年，共出版了 21 卷将近 300 期之多。⁽²⁾该刊最初的主编孙毓修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编译家，他也是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中的资深编辑。⁽³⁾1907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孙毓修便投身儿童读物的编辑工作，在编辑了两套著名的少儿丛书“童话丛书”和“少年丛书”的基础上，孙毓修又创办了这份《少年杂志》。他在创刊号的《缘起》一文中说到了《少年杂志》相对于他编的“童话丛书”而言的区别：

内容大加扩充，如修身、文学、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卫生、动物、植物、矿物、实业、手工、习字、图画、体操、音乐、歌谣、游戏、中国时事、外国时事，凡二十余类。皆择其切近易知、饶有兴趣者，随时编次，互见各册。兼采古今中外之新奇故事，讽世寓言，以供谈助。插画丰富，行文浅显，凡入学三四年之生图，以及粗解文义之人，皆能领会。庶可为教育之补助，而使社会中人，皆晓然知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急急焉。⁽⁴⁾

可见《少年杂志》的内容更加丰富，立意更为深远。

发表丰子恺这篇处女作的《少年杂志》第四卷，则由商务印书馆的另一名老编辑、张元济的海盐老乡朱元善接任主编。他主编《少年杂志》的同时，在 1914 年 7 月还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另一份重要的期刊《学生杂志》，又兼管着《教育杂志》，可见朱元善在该馆期刊编辑方面的重要作用。⁽⁵⁾

文史研究者柳和城也对《少年杂志》的特点作了总结，“注重修身教育，行文寓教于乐”，“发扬爱国精神，拥护辛亥革命”，“传播最新科技，倡导文明卫生”，“提倡游记文学，传扬探险精神”，“开展悬赏活动，提高读者兴趣”。⁽⁶⁾由此可见，这份杂志广受青少年和家长欢迎的原因了。“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如赵景深、吴祖光、费孝通、魏建功等，都曾是它的小读者和小作者。”⁽⁷⁾显然，这份名单遗漏了丰子恺的名字。有趣的是，丰子恺也是杂志举办悬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他发表处女作这期中，有一则公布悬赏活动答案和获奖者揭晓的通知，“丰仁”也名列其中。

对于丰子恺的这篇处女作，姑且不论其文学价值。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丰子恺的学生时代，也正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中国新兴出版企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少年杂志》这类形式新颖的读物，如同为他打开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户，以一种全新启蒙教育的方式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丰子恺天资聪慧，又是一个求知欲强的活泼少年，对于一切新生的、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而身处清末民初时的浙北偏远小镇，接受教育和阅读图书成了满足他求知欲望的最为重要的渠道。丰子恺六岁随父亲接受私塾教育，启蒙读物无非是《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等，父亲去世后，继续在私塾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和《芥子园画谱》之类。⁽⁸⁾而到 13 岁进入新学堂后，丰子恺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大量传播新知识的读物使他耳目一新。“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的新办的小学堂里所唱的歌，大都是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里的歌曲。”直到五十年后，丰子恺还能默写出《学校唱歌集》里他所熟悉的《扬子江》《好朋友》等几首歌曲。另有一首更具中国民族气息的《祖国歌》给他更深的记忆，因为歌曲的作者李叔同后来成为引导

他终身的恩师。^⑤

由上述可以联想，丰子恺日后在文学、音乐、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与他在石门湾小学堂时期的阅读经历是分不开的。而出版业的巨大革新及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处女作《寓言四则》的发表，令丰子恺登上了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舞台——商务印书馆。而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丰子恺则如同是他们早期播下的一颗神奇种子，终于在后面结出了令人惊叹的累累硕果。

二、从崭露头角到盛名远播

丰子恺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短暂从事了一段教学工作后，1921年春即东渡日本开始为期10个月的游学生活。而真正以职业著作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他从日本回国后（或者可以说在归途的轮船上）。促成他走上这条创作之路的，一则是他的出众才华和创作热情，二则是他需要卖文养家糊口。而丰子恺写作生涯最初的舞台，使他从初出茅庐到声名远扬的出版社，正是商务印书馆。丰子恺从创作生涯的最初期逐渐走向成名并最终奠定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商务印书馆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丰子恺通过商务印书馆发表的所有作品的数量和类型。

1922年到1935年间，丰子恺（从25岁到38岁）为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等六大期刊供稿计142篇之多，其中译文17篇、艺术论述51篇、插画和装帧画27幅、漫画27组92幅、散文24篇。^⑥

期刊出版向来是民国时期各大出版社争夺市场的重要阵营。不仅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这样的大型出版机构不断推出面对各个读者阶层的刊物，连一些中小型的出版社也会出版一些各具特色的期刊以占得市场的一席之地。丰子恺如此众多的作品被商务印书馆所采纳发表，亦可见他在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商务印书馆自1904年即创办了《东方杂志》，以后又针对不同的读者阶层陆续创办了多种刊物，他们始终把期刊出版视为重要的业务组成，委派多位资深的编辑负责办刊，因此这些刊物大多在同业内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除了发表在期刊上的作品以外，丰子恺同商务印书馆在书籍上的合作也有十多次。丰子恺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著）即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书为媒介还让他与鲁迅先生产生了联系，引出一段佳话。另外，丰子恺还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种书籍创作封面、插图、环衬等，甚至还做序跋、校阅的工作，亦可谓无所不能。^⑦

丰子恺在人生最为重要的创作阶段能与商务印书馆有如此大量的合作，大致原因如下：一是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无可撼动的实力和地位，成为大部分投稿作者的首选，能给作者带来稳定的名利回报；二是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和个人处女作的发表，使丰子恺对商务印书馆产生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三是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编译人员之间广泛的人脉联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丰子恺从崭露头角到盛名远播，一直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逐步形成了他后来的诸多文化成就。

三、与商务印书馆在报刊及图书出版方面的合作

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不但在其旗下各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而且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本译作，逐步形成了他后来的诸多文化成就。

^⑤①本文尚未针对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中是否采用丰子恺的文章或插图进行过调研。

（一）与报刊的合作

1.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 1904 年，1912 年由杜亚泉“主编历八年，于世界大势、国家政象、社会演变、学术思潮，靡不搜集编载，研究讨论，贡献于国人”。^⑥《东方杂志》持续出版了 44 年，1948 年底停刊，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份综合性期刊。

1922 年 4 月，丰子恺在上海翻译了美国作家 Nathaniel Hawthorne 的短篇小说《泉上的幻影》，发表在 5 月 10 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9 号上。^{⑦⑧}这是丰子恺首次正式发表的译作，也从此开启了丰子恺同商务印书馆之间长期密切的合作。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丰子恺最早的翻译作品是屠格涅夫的《初恋》（在日本归国途中的轮船上开始翻译），完成后也是向商务印书馆投的稿。但这部译稿的发表却并不顺利：“这是丰氏从事艺术事业的处女作。此书于一九二一年冬在由日本回国的轮船上开始翻译，一九二二年初交商务印书馆，却不料被该馆认为‘诲淫’之作而退了回来。”^⑧但丰子恺本人在 1929 年开明书店出版此书所作的译者序中，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八年之前，我在东京购得一册《初恋》的英日对译本，英译者为 Garnett，日译并注者是藤浪由之。读了之后，对于其文章特别感到兴味，就初试翻译。1922 年春间译毕。这是我第一次从事翻译。自知译得很草率，不敢发表。曾请几位师友改改，看看。后来一直塞在书架上面。”^⑨写此序时，丰子恺的大量文章和绘画正频繁发表在商务印书馆的各大刊物上，他或许是不便提及当年被商务印书馆退稿之事吧。

1924 年，丰子恺的良师益友夏丏尊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他的著名翻译作品《爱的教育》，而其中的插图便由丰子恺创作，这也是他最早期的插图作品。^{④②④}

似乎是为应对《东方杂志》内容的综合性，丰子恺的作品在《东方杂志》上同样呈现出多才多艺。从作品的类型来看，从译文、艺术论述到散文，从插图、漫画到封面设计，几乎涵盖了丰子恺所有的创作形式。即使在《东方杂志》历来强大的作者群中，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丰子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组他对中国画研究的文章。在 1930 年 1 月出版的两期“中国美术号”特刊上，分别刊登了《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中国的绘画思想——金原省吾的画六法论》《东洋画六法的论理的研究》和《云岗石窟》四篇文章，丰子恺成为这两期特刊中发文最多的作者。丰子恺不仅从世界绘画发展趋势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画的优势所在，而且还通过评论日本学者的著作，开始对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理论进行研究。另外，他还在《东方杂志》另一期上发表过《中国画的特色——画中有诗》。上述文章阐述的内容组成了丰子恺对于中国画研究的思想体系，是丰子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2. 《教育杂志》。创办于 1909 年，先后由陆费逵、朱元善、李石岑、周予同、何炳松等担任主编。虽然因日本侵华战争两度停办，但前后依然出版了 33 卷 382 期，在中国的教育类期刊中独占鳌头。

丰子恺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数量是各种刊物中最多的。作品的主题分西洋音乐、西洋美术、少儿艺术教育和教育题材漫画四部分。丰子恺以担任教师开始走上社会，并长期从事这一职业，《教育杂志》所发表的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教育思想有所反映。

1930 年和 1931 年，他应邀为《教育杂志》“儿童艺术讲话”栏目所写的两组西方艺术启蒙的文章，后来被结集成《西洋名画巡礼》和《西洋音乐楔子》，成为重要的西方艺术评论著作，由开明书店在 1931 年 6 月和 1932 年 12 月分别出版，后来又多

^{④①}丰子恺在文末备注：“Hawthorne 善于精妙深刻地描写心理状态，他底杂著是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出版的，名叫 Twice-told Tales。这也是其中的一篇。”

^②《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2 号的实际出版时间为 1924 年，而非《丰子恺年谱长编》所订的 1923 年。

次重版。

丰子恺在《教育杂志》上还翻译了美国、日本多位艺术教育研究专家如 H-Muensterberg、关宽之、阿部重等人的最新艺术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章，后被收入《艺术教育》《艺术丛话》等多种专著中。

《教育杂志》也是丰子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物上发表漫画最多的一种期刊。这些漫画基本上以儿童、教育、校园等为主题，如 1926 年和 1927 年两年间，发表了 8 组共 46 幅漫画中，有《校园生活片断》《小瞻瞻的梦》《自然之默谕》《教育界的人物》《艺术的劳动》等组画，集教育、知识、艺术、趣味于一体，令读者产生良好的阅读体验。

3. 《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文学期刊，1910 年由样铁樵、王蕴章主编时期，以通俗文学（即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导，到 1921 年由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接编之后全面革新，成为新文学的核心阵地。《小说月报》共出版 22 卷 258 期，因 1932 年初中日淞沪战争爆发而停刊。

1926 年至 1928 年间，丰子恺应郑振铎之邀为《小说月报》作了整整 3 卷 30 多幅的扉页插画。评论家将其称为“人生的诗意的表达”。^[10]这组插画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丰子恺的艺术思想，为他在装帧画领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丰子恺以散文、漫画和艺术教育闻名于世，而实际上他的装帧画同样精彩，他这方面的艺术水平比他那两位以装帧艺术而知名的学生陶元庆和钱君匋更为出色。可见，通过“文学的绘画”，彰显“希望的人生”，达到“美誉的启示”，丰子恺以极高的艺术修养和勤奋创作，使他的作品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在这方面，也可以看到他的老师李叔同带给他的影响。^[10]

《小说月报》对于丰子恺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便是《缘缘堂随笔》的诞生。从 1927 年 6 月开始，丰子恺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刊发《忆儿时》《华瞻的日记》等散文。到 1929 年，总共发表了 15 篇。正是同年秋天，丰子恺在江湾永义里住宅内，由弘一法师引领，举行了皈依仪式并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这组散文后来以《缘缘堂随笔》为名结集出版，成为丰子恺一生中最重要的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缘缘堂随笔》在 1931 年 1 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到 1948 年就已经重印了十几次，解放后又由多家出版社编辑重版，书中作品以其“清隽美”的文笔“显示了他在生活上所具有的思想情趣之重要部分——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宗教观”，成为中国散文作品中的瑰宝。^[11]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也发评论称赞此书，称丰子恺是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⑤

4. 《小说世界》。在《小说月报》转型为新文学刊物之后，商务印书馆为保持其在大众文学期刊市场上的地位，特办《小说世界》。以胡寄尘担任主编的《小说世界》，在“鸳鸯蝴蝶派格局下做了一些试图打通‘新’与‘旧’、变‘俗’为‘雅’”的努力，尽管并不是太明显”。^[12]

胡寄尘邀请丰子恺为《小说世界》提供漫画，可以理解为他试图打通新旧文学之间隔阂的一种努力。同时，胡寄尘还在《小说世界》上刊登了他的旧友也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的大量诗文、书画作品，以此表达对这师生两人的敬意。

丰子恺在《小说世界》上的作品长期未受关注。从目前的资料可知，丰子恺在《小说世界》上发表的漫画不少于 4 幅，这些均未收入已出版的《丰子恺全集·美术卷》和《丰子恺年谱长编》（修订版）中。

5. 《妇女杂志》《学生杂志》。或许是精力所限，同时还要应付其他出版社的约稿，丰子恺在商务印书馆的另外两大期刊《妇女杂志》和《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数量较少。但这并不代表他忽视妇女和学生问题。在推动妇女解放方面，丰子恺始终走在社会最前端。在 1923 年 1 月出版的“妇女运动号”上，丰子恺发表瑞典爱伦凯《妇女运动概论》的译文，由此也能反映他和主编章锡琛、周予同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共同的激进思考。

^⑤①参见丰子恺《致〈导报〉编者》（《丰子恺全集》第 20 卷，海豚出版社，2016 年版，第 98 页）。

这期间丰子恺有大量的关于妇女问题、学生题材的文章发表在其他如《民国日报》《妇女周报》及《中学生》等相关刊物上。

综上，丰子恺同商务印书馆六大刊物的紧密合作，一是合作时间长，合作内容广泛，在诸多作者中尤为特殊；二是这种合作对丰子恺个人在文艺领域的多项成就有开创性的意义；三是这种合作对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期刊出版转型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帮助作用。

（二）图书出版方面的合作

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在图书出版方面，也多有合作。

1. 《苦闷的象征》的出版。《苦闷的象征》是丰子恺的第一本译著，翻译的是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遗作。原作于1924年在日本出版后不久，即受到鲁迅和丰子恺的关注，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各自的翻译工作。鲁迅的译作于1924年12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后又由北新书局再版。丰子恺的译著于1925年3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也是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一部作品几乎同时由两位译者推出，这种情况是比较鲜见的，更由于译者都是文艺界标杆性人物，也引发了后来研究者较为广泛的讨论和比较。

丰子恺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时间较晚，从会员编号来推测，大约在1924年。可见，这一时期丰子恺已初步确立了社会地位，具备了较为深厚的文化品位，而此时的鲁迅早已经是文化名家了。

从翻译学角度，也有学者对两部译作进行了分析对比：“鲁迅采用字字落实的直译法，翻译时过于重视原文的形式，而忽视了译文的语言表达。这导致译文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导致读者难以理解或产生误解。丰子恺也是采取的直译法，但在遣词造句上不似鲁迅按部就班，能结合上下文的语境选用词语。译文不仅忠实于原文，也顺应了译入语的表达习惯。”^[13]对此，抗战时期在桂林重返教师岗位的丰子恺在日记中还提及：“今天我教他们读厨川白村的 Essay……鲁迅先生译笔太过严谨，有几处难怪学生看不懂。经我在黑板上改译中国文式的，犹有人看不懂。”^[14]不经意间，丰子恺也透露了自己和鲁迅先生不同的翻译风格。

鲁迅与丰子恺在1927年的第一次见面，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迹可循。虽然两人并不一定是为《苦闷的象征》而见的。但有趣的是，带丰子恺见鲁迅的陶元庆，既是鲁迅译《苦闷的象征》的封面装帧设计者，又是丰子恺的学生，由他穿针引线是再合适不过的。

2. 书籍装帧等创作。1924年，丰子恺开始为文学研究会的期刊《文学周报》提供漫画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尤其是郑振铎、茅盾等人对其风格甚为赞赏。随后便有作者陆续邀请他为自己的著作做绘画装帧的设计。丰子恺的书籍装帧作品，最早是为夏丏尊翻译的小说《棉被》作封面装帧画、为郑振铎《文学大纲》环衬作设计图。

以后，丰子恺又为罗黑脂的《醉里》、谢六逸的《文坛逸话》、王统照的《黄昏》作了封面装帧。

1930年，丰子恺为巴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本译著《草原故事》和《我底自传》分别作了封面装帧画和题字。

除此以外，丰子恺还为自己老师姜丹书的《艺用解剖学》设计了封面，为周越然编写的英语读物《英语卅二故事》作了一组插图，为刘诚甫编的《音乐辞典》作了扉页题字和校阅。

根据最近的资料发现，丰子恺还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改版后的小学教科书设计了3种封面。显然，出版社是想利用丰子恺漫画的社会影响力，在竞争激烈的教科书市场里占得一份先机。

另外，丰子恺还为王庆勋《最新口琴吹奏法》作了序言。

四、时代背景及人脉关系

在丰子恺这段最为重要的写作人生中，与商务印书馆发生了如此紧密的合作关系。追本溯源，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内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有关。

（一）时代背景

民国初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浪潮不断冲击社会各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大期刊先后遭到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的抨击与诟病。

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率先发难。1918年9月《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发文《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文中一连提出16条质问，措辞激烈犀利。此举既打压了这份知名大刊，同时又提升了《新青年》的知名度，可谓一举两得。而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罗家伦也紧随师长陈独秀，在北京发起成立“新潮社”，在社刊《新潮》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印书馆的几种主要期刊逐个批评一通。

新文化思潮在社会上的盛行，对于杂志的主要阅读群体——青年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出版发行业务在这一阶段确实受到了较大影响，刊物因滞销还产生了大量库存。

为此，以张元济为主导的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开始谋划对策，思考如何转型。1920年，从《东方杂志》开始，《学生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等纷纷更换编辑团队，采用白话文，改变刊文内容，逐步开放接纳不断进步的社会思潮。^③

1922年，在胡适的推荐下，王云五正式入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人事上推陈出新，许多新面孔在各大期刊的编辑队伍之中被委以重任，其中就有许多是丰子恺的新朋旧友。

丰子恺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发表作品在1922年5月份，恰好是王云五到任后不久。这个巧合也预示着丰子恺在未来的十多年里，利用自己在商务印书馆丰富的人脉资源，在创作道路上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

丰子恺和这些朋友的关系，同他在白马湖春晖中学和江湾立达中学的执教生涯，以及他参与创办或者加入的中华美育会、文学研究会、立达学会等组织之间，有着纵横交错的关联。这些关系最后交集到商务印书馆，形成一个牢固的“朋友圈”，对丰子恺大量作品的发表出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人脉关系

在丰子恺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朋友圈内，有胡寄尘、章锡琛、叶圣陶、茅盾、胡愈之、周予同、谢六逸、郑振铎、徐调孚、金仲华等人，这些人大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陆续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但他们同丰子恺的友谊却持续未断。

下面，就上述丰子恺的朋友们在商务印书馆时期同丰子恺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个以商务印书馆为核心的朋友圈，曾经构筑起一个复杂密集的知识界的人际网络，其中更详细的内容，有待更深入的调研。

1. 胡寄尘(1886-1938)。字怀琛，安徽泾县人。胡朴安之弟，胡道静之父。他与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同为南社社员，并在1912年同在《太平洋报》担任编辑。早在1919年，胡寄尘与丰子恺就共同参与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第二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美育

学术刊物《美育》。1924年，胡寄尘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叶劲风任《小说世界》主编，在此期间，他安排发表了李叔同、丰子恺师徒两人大量的书法、绘画作品。其中发表丰子恺漫画作品至少有四幅，具体数量还待进一步查考。1930年5月，丰子恺还曾为胡朴安、胡寄尘兄弟编辑的古代诗歌集《子夜歌》作插图一幅。

2. 章锡琛(1889-1969)。章锡琛191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随绍兴同乡前辈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达九年之久。1921年，他出任《妇女杂志》主编，将这份“中国现代妇女报刊史上历时最长，发行面最广的刊物”，带入了一个“革命与激进”的新时期。因为他对出版新型妇女刊物的执着信念，1925年底被商务印书馆解雇。次年，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丰子恺在章锡琛接编《妇女杂志》初期，曾发表过两篇译作，其中在1923年1月该刊“妇女运动号”上发表译作《妇女运动概论》，标志着丰子恺同章锡琛、周予同一起开启了接受国外妇女解放运动新思潮的序幕，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主流思想，带来了一场新旧思想两大阵营的激烈争论。^[15]章锡琛同丰子恺的关系由此愈加紧密，尤其在开办开明书店后，丰子恺不仅是该书店的最重要作者之一，更是出资成为书店股东。1928年10月，丰子恺与章锡琛等共同为钱君匋制订画例。

3. 叶圣陶(1894-1988)。叶圣陶于1921年7月应邀往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国文，至11月离开。而这一年冬天，丰子恺从日本游学回国后，也曾到中国公学中学部短暂兼职。两人最初的交往有可能始于此时。1922年5月，丰子恺第一篇译文发表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上，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啼声》同时在该期发表，两篇文章前后紧挨，这种巧合也印证了两人在创作上的早期接触。1923年1月，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1926年1月，丰子恺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由《文学周报》社出版，叶圣陶参与了此书的编选工作。同年3月25日，叶圣陶加入立达学会，当晚同丰子恺等好友一起聚餐。1927年5月，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继续发表丰子恺的扉页插画，同时开始发表丰子恺后来结集为《缘缘堂随笔》的大部分散文，叶圣陶应当也是这部著名散文集的直接促成者。这一年的10月，他同周予同等人随丰子恺拜会了到上海的弘一法师，并写下《两法师》一文。1931年2月，叶圣陶离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入职开明书店，持续着与已成为开明书店股东的丰子恺的友谊。^[16]从文学研究会到立达学会，从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叶圣陶长期同丰子恺保持联系，是丰子恺毕生交往最密集的朋友之一。1975年10月，叶圣陶得知丰子恺去世的消息：“不胜悲痛，感怀万端，写下了《追念子恺老友》的诗篇：‘故交又复一人逝，潇洒风神永忆渠。……十载所希归怆恨，再谋一面愿终虚。’”^[17]

4. 茅盾(1896-1981)。1916年，茅盾进商务印书馆，1926年离开。从茅盾接编《小说月报》，到创办文学研究会，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同丰子恺有过交往。1922年，丰子恺三姐丰满与丈夫徐家不和提出离婚，曾请茅盾出面调解。按此线索，两人的交往是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并早于丰子恺加入文学研究会时间。^[18]郑振铎在1926年出版的《子恺漫画》序言中，曾详细描述他同叶圣陶、茅盾共同商量此书出版的细节，感觉丰子恺提供的画稿“实在没有什么可弃的东西”。^[18]丰子恺和茅盾既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又都是立达学会会员，但两人间更多的交往情况还有待继续考订。

5. 胡愈之(1896-1986)。1914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练习生。1917年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文章，直至1928年赴欧洲游学。1920年胡愈之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胡愈之还参加了由丰子恺等发起成立的立达学会，1927年3月，有同丰子恺、郑振铎、周予同、叶圣陶等学会同仁聚餐的记录。1928年12月，丰子恺与胡仲持(胡愈之弟弟)等共同发起改组开明书店。1932年胡愈之应王云五邀请重回商务印书馆主持《东方杂志》复刊。在1933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选用了丰子恺关于新年梦想的一组六幅漫画，包括母亲、教师、建筑家、黄包车夫、投稿者等的梦想，其中一幅儿童的梦想登上了该期的封面。同时，胡愈之还邀请了100多位各界名人撰写了个人的新年梦想并刊发于此期。也因此事，胡愈之与馆方就编辑理念发生冲突，不久后中止了主编的工作。

6. 周予同(1898-1981)。周予同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先锋，他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匡互生(后来又与丰子恺同事春晖共创立达中学)一起点火烧毁了曹汝霖的赵家楼。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任《教育杂志》编辑，长达十年。直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离开。而丰子恺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漫画，基本上集中在这段时间。同样，作为立达学会的会员，丰子恺与周予同也有过频繁的交往。

7. 谢六逸(1898-1945)。1922年4月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实用字典部任职,年底离职。丰子恺同谢六逸的交往,应当大多源自于文学研究会会员间的关系网。1928年,丰子恺为谢六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坛逸话》设计封面。1929年,他又为谢六逸在大江书铺出版翻译作品《近代日本小品文选》作封面。

8. 郑振铎(1898-1958)。1921年11月进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职。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1927-1928年赴欧旅行期间由叶圣陶代编。回国后继续任主编至1930年离开商务印书馆。丰子恺在1924年为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诗文集《我们的七月》作漫画插图《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郑振铎见之,感觉“有说不出的美感”,“情思被带到诗的境界”,由此对丰子恺的作品非常关注。〔8〕3后来,郑邀请丰子恺在自己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发表系列漫画。1926年,为丰子恺策划出版了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郑振铎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1925年),开始发表丰子恺的漫画,并且从1926年《小说月报》第17卷起,邀请丰子恺创作每期的扉页插画,连续三年。这组作品成为丰子恺插画艺术的重要代表。1927年,郑振铎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学大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特意邀请丰子恺作此书环衬的设计。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立达学会的会员之一。在这两个组织的多次聚会上,他同丰子恺经常相见。1948年春,丰子恺同阔别10多年的郑振铎在西湖边相逢,相约同饮,共话旧情。一篇《湖畔夜饮》,道出了两人20多年前即开始的个人和家庭间的深厚友情。〔19〕

9. 徐调孚(1901-1982)。曾就读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1921年进商务印书馆,1922年转《小说月报》社协助郑振铎担任编辑。1928年6月,丰子恺为徐调孚的《木偶奇遇记》作封面画,此书在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直至1933年4月,离开前他任《东方杂志》文艺栏目的编辑,还在该刊为丰子恺编发了《怜伤》和《陋巷》两篇散文。5月,他便转投开明书店任编辑,继续同丰子恺的长期交往。

10. 金仲华(1907-1968)。1928年春应聘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妇女杂志》助理编辑。1932年,协助胡愈之担任《东方杂志》“妇女与家庭”栏目的社外编辑。1933年底,加入开明书店协助叶圣陶编辑《中学生》杂志。〔20〕金仲华同丰子恺是同乡(浙江桐乡人)。1931年丰子恺在《妇女杂志》发表了两篇面向妇女谈论音乐和绘画研究的文章,时间正处于叶圣陶与金仲华交接之间,而这两期刊物上也同时刊登了金仲华著译的文章。

上述几位与丰子恺关系密切的好友,始终都跟丰子恺保持着各自的友谊。这与丰子恺洒脱无私的性格、直爽简单的个人魅力不无关系。关于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乃至民国出版界的人际交往,一定会有更多的有价值的线索可以去探究。

五、结语

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互动,也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探索文化人物与出版界的关系,可以追寻社会进步的某种内因和轨迹。丰子恺从一个好学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在文化界举足轻重的杰出者,商务印书馆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是其他出版社(包括开明书店在内)所无法相比的。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共同选择,成就了现代出版史上一段佳话,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启迪。

参考文献:

〔1〕丰子恺.寓言四则〔J〕·少年杂志,1914,4(2):2-5.

〔2〕柳和城.孙毓修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柳和城.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4〕陈星.丰子恺年谱长编〔M〕.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 [5]丰子恺. 回忆儿时的唱歌[M]//陈星, 刘晨, 主编. 丰子恺全集: 15 卷.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 213.
- [6]蔡元培. 杜亚泉君传[M]//田见业, 等, 编. 杜亚泉文选,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3.
- [7]NATHANIEL HAWTHORNE. 泉上的幻影[J]. 丰仁, 译. 东方杂志, 1922, 19(9): 94-100.
- [8]丰一吟, 丰陈宝, 丰宛音, 等. 丰子恺传[J].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189.
- [9]丰子恺. 《初恋》译者序[M]//陈星, 刘晨, 主编. 丰子恺全集: 4 卷.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 61.
- [10]王文新. 丰子恺插图艺术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11]陈子展. 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J]. 青年界, 1932, 2(1).
- [12]董丽敏.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87.
- [13]沈聪. 浅谈描写译学的理论与实践——以《苦闷的象征》的两个中译本为例[J]. 安徽文学, 2018(10): 51-52.
- [14]丰子恺. 日记: 一九三八年[M]//陈星, 刘晨, 主编. 丰子恺全集: 20 卷.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 264.
- [15]章雪峰. 中国出版家·章锡琛[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52.
- [16]商金林. 叶圣陶年谱长编: 1 卷[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45.
- [17]陈辽. 叶圣陶传记[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222.
- [18]郑振铎. 《子恺漫画》序言[M]. 5 版. 上海: 开明书店, 1929.
- [19]丰子恺. 湖畔夜饮[M]//陈星, 刘晨, 主编. 丰子恺全集: 5 卷.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 87.
- [20]徐丽萍, 褚红斌. 金仲华年谱[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8.